

我和沈寂同年,俱为88岁,我们的友情可谓绵长,至今已有70个年头,属于“古稀”级。1941年,18岁的我们作为喜爱文学的大学生,相继在当时甫问世即红遍上海的《万象》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。我的文笔很幼稚,题材也很无聊,写几个大学生为争夺一个女生的欢心而勾心斗角,尔虞我诈。沈寂则比我强得多,他写的《盗马贼》等几个小说,都是血淋淋的现实生活,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,而且获得《万象》总编辑柯灵先生的赏识,把他招在麾下,年纪轻轻就当《万象》的一名编辑,1946年又主编《幸福》杂志,从此走上了文学这条崇高而又艰辛的道路。

1945年,我大学毕业后,进入美国华纳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做宣传工作,经常在电影院或公司小放映室放映华纳新片,招待文化新闻界人士,董乐山、李君维、朱雷、马博良、吴承惠(秦绿枝)、姚芳藻、吴芳、徐汝椿、周建华等一批“小荷初露尖尖角”的文坛新人,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的终生朋友,其中好几位已经作古了。沈寂则由于早几年同为《万象》写稿,关系更深了一层。

我和沈寂的友谊是

U字形的,两头(解放前一头和改革开放后一头)热,中间空了一大块,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,这里无须细说。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,我始终默默地做着翻译西方学术名著这项“略显枯燥”(李君维语)的工作,沈寂则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《大亨》《大班》《大世界》等大部头著作,并且借助他在电影方面深厚的积累写了许多有价值的专著。我们两人在工作上都很执着、专注,生活方面则有许多共同的爱好,比如喝咖啡,吃红烧肉,这更有助于我们走在一起。



我和沈寂还有一点相同,就是婚姻都很美满,而且都已经幸运地度过了被称为“婚姻最高峰”的钻石婚。我们两对夫妻在人生道路上都经历过惊涛骇浪,但是大家风雨同舟,相濡以沫,终于克服重重困难,胜利地迎来了美好的新生活。

崇明杨亚东是我的挚友,也是铁杆的沈寂迷,凡是沈寂写的书,他每本都买,而且要求作者签名留念。亚东知道沈寂和我今年都是88岁米寿,便主动提出要为我们祝寿。我和沈寂曾经都以为自己活不到80岁,但欣逢盛世,居然都活到这个超高年龄,庆一下似亦无妨,便欣然同意了。

祝寿活动在舍间进行,出席者除“寿星”沈寂和我两对夫妇加上杨亚东夫妇外,还有杨的几位亲人以及我夫人张芝的好友徐青。特邀贵宾只有一位,就是《夜光杯》专栏作者秦绿枝,我和他的友谊已有60多年了,亚东对他的小品也很爱读。11人中最大88岁,最小73岁,总年龄超过900岁,如果再增一人,可以号称“千岁宴”了。

我和沈寂都是食肉动物,嗜肉如命。我们都认定一个死理:宁可多吃肉少活几年,也不愿少吃肉多活几年,如果多吃肉真能影响人的生命健康的话。沈寂坚信他的一位医生朋友对他说过的一句话:凡是吃在肚里感到舒服受用的东西就是好东西,尽吃无妨。我则深信日本科学家做的一项实验:肉烧煮5小时以上,有害的脂肪即转化为有益的物质。实际上,医生也好,科学家也罢,我们都是为爱吃肉制造舆论,有自欺欺人之嫌。

正因为大家都爱吃肉,菜肴以肉为主,有红烧肉、白切肉、走油肉、啤酒烤肉,还有一猪大块的清炖蹄膀,真是肉肉肉地。我故乡海盐的特色菜虾仁焖蛋,制法简单,风味特佳,端上桌即一抢而空。最珍贵的“不是价值,而是珍贵”当推亚东夫妇当天早晨亲自在崇明鱼码头守候数小时才购得,装在盛满冰块的塑料箱里,菜场上难觅踪影的凤尾鱼(上海人叫烤鱼),个儿大,鱼子多,鲜美无比。明知凤尾鱼胆固醇高,不利于痛风病人,我还是忍不住一连吃了好几条(当然是趁夫人不备的时候)。

既然都是老人,席间谈话自然离不开一个老字。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叹时间过得真快,一年功夫,一晃就过去了。其实时间过得快或慢只是心理因素,日子总得一天天过,今天的一天和从前的一天不会有丝毫差别,不会多一秒,也不会少一秒。旧社会生活艰难,所以有“度日如年”之感,新社会生活好了,活动多了,节奏快了,就变成“度年如日”了。话题又转到养生上面。说也奇怪,11人中,没有一人提得出有一套完整的养生之道。沈寂和我也从不知道锻炼身体,当年董乐山提出“十不主义”,比如不

黑面、霸丸:

碧潭派出所的钟警员来家中问询,取出一张监视器里下载的影本,说找到了嫌犯,他指着图里两个迎面而来的年轻人问道:“认识吗?”我摇摇头。图片不很清楚,戴帽子这背,肤色较暗,大眼粗鼻,右肩背一大口袋,就称“黑面”吧!旁边的那人,和你一样又壮又圆,说不上五官特征,姑且叫“霸丸”好了。

四个月以来,只要走进客厅,往位置正中的木柜看去,就不禁叹一口气。原本分列在玫瑰瓷花篮两端的对对象牙,早已不知去向。古雅精致的玫瑰瓷花篮,是妈妈送的结婚礼物;那对来自泰国,弯度达七十厘米长的象牙,则是另一件“聘礼”,前前后后应有五十年历史了。如今,形单影只的磁花篮,失去了身旁的护法,显得分外孤单。

黑面、霸丸,你们才刚进门,象牙只是个“见面礼”,走向书房,四眼环顾,想必是唯恐漏失了什么。满墙满柜的书,不约而同齐声苦劝:“期期不可!快快罢手!登门入户是盗匪的行为,不劳而获是可耻的懦弱,你二人好手好脚,耳聪目明;年纪轻轻,头好壮壮,何必做这等不上路的行当?”

霸丸你嘿嘿干笑,一个箭步取下挂在墙面上的画框,里头嵌

运动、不锻炼、不打太极拳、不练气功,我们都很赞成。究其原因,是我们这些人都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了,没有闲工夫考虑养生。大家一致认为对养生还是重要的,只是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,过多的研究养生没有太大意义,入魔更是自讨苦吃,根据自己身体状况,适当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秦绿枝最讲究“适性”,扔出一句“爱怎么活就怎么活”,我认为是有道理的。

我有一瓶珍藏已久的茅台酒,是已故名中医李国衡送的,一直放着舍不得喝,这回想拿出来凑个热闹,可秦绿枝坚决不许,说还是留待两年后90岁大庆时再喝,那样意义就更大了。我当即表示能否再活两年尚是个问题,还是今日有酒今日醉吧。沈寂却批评我不应该消极地过一天是一天,而应该积极地争取多活几年,100岁或许有点难,90岁总应该有信心吧。于是,在一片拍手欢笑声中,我把茅台酒又收了起来,就让我们大家养好身体,信心满满地期待90岁大庆那天原班人马再来欢聚一堂,开怀畅饮吧!

《枯木逢春》中饰演过角色)和《解放日报》美编张楚良结婚的时候,就住在1号,后来搬出去了。五年前,曹聚仁的女儿、著名配音演员曹雷,儿子、凤凰卫视新闻评论员曹景行,还到这里来白相,寻找童年的印象,和我们这些小时候的老朋友谈得很开心。谈到父亲曹聚仁,曹雷说,我爸爸从小不太关心我们姐弟俩,他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,他1960年去香港,是肩负“秘使”重任,做沟通统战工作,所以1972年他走后,周总理称他为“爱国人士”。这一天,曹家姐弟还和我们在弄堂口合影留念。

(葛建平、刘莹整理)

十日谈 明刊一篇
《东洋人不炸石库门生活口述 瑞康里》

写给黑面和霸丸的一封信

(台湾) 桂文亚

了个斯文小玉人儿。玉人儿惊惶地张嘴欲喊,尚未发出虚弱的一声“NO!”你已用利刀撬开背板,把他整个儿挖了出来。

黑面,霸丸,这小玉人儿是我的书僮,离乡背井栖身客地已十余年,陪我读书写字,吟诗作画,生活倒也宁和,是北京姐姐馈赠的一份珍贵纪念品。如今,你把他逐出书香天堂,一旦发现毫不值钱,会一脚踩烂?还是顺手扔进臭烘烘的垃圾筒?

那天深夜到派出所做笔录,只能在匆忙中将发现失窃之物报上。卧房五斗柜里的抽屉毫无疑问被扫光了:妈妈、妹妹及好友在我生日时送的手表、挂表、坠饰、项链、耳环、戒指……还有一只伊斯坦布尔绘上红眼蓝鸟的镶金磁盒收藏,也被洗劫一空。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再一检视,怎么?木柜里一整个抽屉也全清空!这抽屉收存的是二十余岁至今,文友所赠的藏书章与未及雕刻的印石,其中包括青田、寿山、绿松、象牙、鸡血和水晶等较知名的材质。一位长辈,二十多年前送了我一盒自刻的藏书章共十枚,我常取出这方寸之美细细玩味,沉浸于浓郁的书香与厚爱之中,如今,这雅致的

金石情怀业已香消玉殒乎?这些失去的物件,原是我幸福记忆中的物证,如童年时藏在抽屉里的宝贝:哪怕一张洒满银粉的耶诞卡、一粒浑圆透明的花纹弹珠、一张缤纷美丽的糖果纸;在心中,皆象征着无可取代的亲情和友情。这曾经岁岁年年带给我甜美与温馨的纪念物,从此失去对主人的依靠与珍爱,是何等伤感的命运?

黑面、霸丸,如果有一天,府上也遭人闯入,所有物件无论贵贱,被任意翻弄,所有纪念物品全部人间蒸发,甚至,像我一个年轻的朋友,借钱购买的唯一值钱电脑被偷;一个独居的老太太,窃者气她身无长物,干脆在床上留一坨秽物,你能无动于衷,一笑置之?

偷窃绝非“小恶”,这是一种侵犯,一种霸凌,除了让人有形的损失,更是一种对他人严重的精神屈辱和暴行。黑面、霸丸,你允许手上拿着的一个甜筒冰淇淋被陌生人猛啃一口?或是藏在衣袋里的钱包,被另一位“三只手”摸走?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“欠揍”的行为,那么,你哥儿俩又该给我这“伤心人”一个怎样的说法?

还有一问:放在厨房里那刚开瓶的蜂蜜,被你们顺手带回去饮用的时候,当真没尝出一些苦涩的滋味?



我外婆家搬到重庆南路的巴黎新村,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初。我当时还在念小学,并不关心此地住过某某、某某名人;我感兴趣的是外婆家前门的小园子蛮大的。但园子里很荒芜,仅有一棵稀秃秃的石榴树歪在墙角;翻开近旁倒扣着的大瓦缸,不见蟋蟀,两只驼背小灶鸡傻不拉几地望着我,我玩得无趣,便想着种树种花。小阿姨就带我在西门路小摊头上买了棵小小桑树苗,很便宜,几分钱。想不到小桑树长得很快,隔年春天就比我高很多。往后,麻烦的事情就来了。

弄堂里有个喜欢养蚕宝宝的小朋友,偷偷翻进了外婆家小花园的矮墙。我尖声叫喊:喂喂喂,啥人容许依来采桑叶!小朋友也老实,一做亏心事就吓了,连忙翻出矮墙就逃远了。我沮丧地向外婆告状。外婆却心平气和地说:算了算了,不就是摘了几片叶子。想不到几天后又又有三个小朋友合伙翻墙进来了。这次我拉着外婆赶去。他们一看大人来了,又慌慌张张翻矮墙。两个一溜烟没了影子。另一个瘦瘦的摔了跟头,合扑在地爬不起来了,手里的桑叶撒了一地。我打开园子小铁门抓住他,神气地说:你住在几号

里?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去!那个小孩害怕了,泪水流出来了,摔破的膝盖上血也流出来了。外婆叫我松开手,把他从地上扶起来,还叫我进屋去拿红药水和药水棉花。我傻住了。外婆又连连催:去呀,去呀。我只好照办。外婆笑眯眯地给小朋友的膝盖上擦红药水,还拾起地上一张张桑叶塞到小朋友手里,摸摸他的头,说,回去吧,下次要桑叶,同我说一声,不要翻墙头,

忽然想到了京昆大家梅兰芳。梅先生想来正儿八经坐塾堂念书没几年罢,然其一生与文人学者交往甚多,好学,且又善博采前辈、同行之精粹,多年磨砺遂成青衣一代宗师。我惊讶于先生的兰花扇面,浓枯相宜寥寥数笔,居然等地简约秀雅。

昨日一拨戏迷老人痴恋久久的《贵妃醉酒》似把我们带回到了遥远的多事之秋:鼓点、略带慵慵懒慢,夜深沉,微醺的贵妃步

你看,摔跤了。那个惊恐的小朋友直愣愣地用两只泪眼不解地望着外婆。等到他明白了一切,模模糊糊地从嘴里说出了几个字:谢谢阿婆。一拐一拐地走远了。

我很不解气地问外婆:为什么把这个偷桑叶的人放了?外婆依然是笑眯眯地说:几片桑叶,说偷,太难听了。人家摘去,是给蚕宝宝吃的。蚕宝宝吐了丝好织衣裳。人家做的也是好事。你要记得,与人为善。我当时似懂非懂。但,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我居然对此还印象深刻。外婆当时已是五十好几了,她虽然没念过书,但经常会讲出让别人怔一怔的话。过了几天,外婆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:白天的时候,你把花园的小铁门打开。我说:为啥?外婆笑了:让人家来摘桑叶呀!省得爬墙,摔跤。树啊草啊,长在世界上,本来就是大家的。让别人方便点,省几个铜板,不是蛮好。市区中心,别的地方哪有桑叶可摘?

小铁门就这样打开了。起先有几个小朋友到此探头探脑,还有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。外婆笑着说,小朋友,进来吧,要桑叶自己摘。小朋友乐了,说一声,谢谢外婆,就直奔桑树。后来一批又一批的陌生面孔出现了,我很奇怪,新村里哪来这么多人养蚕宝宝?原来附近小学门口小摊边上都传开了:走走走,到巴黎新村摘桑叶去!有个外婆老好额,不骂阿拉额!

非常可惜的是,巴黎新村的桑树名声太大了,年年来摘桑叶的人络绎不绝,桑树年年被摘了个精光。它终于枯死了。一个一个又一个小小朋友,望着光秃秃的树干,两眼充满了失望。外婆见了他们,叹了口气,也有点失望,有点愧疚。

身手做派纯背对观众,个中连背影都有梅先生神韵。此刻,还用絮叨什么京剧文化么。泱泱深厚的中华文化,不经意已逾千秋。我奢望,纵能吮吸她点滴乳汁那将会是无上福分呀。

身手做派纯背对观众,个中连背影都有梅先生神韵。此刻,还用絮叨什么京剧文化么。泱泱深厚的中华文化,不经意已逾千秋。我奢望,纵能吮吸她点滴乳汁那将会是无上福分呀。



书法 庄殊嫖

我家住在溧阳路1335弄2号。1949年我就出生在这里。当时我们住在二楼,60多个平方米,家里有多娘和我,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很宽敞的。

我们这个弄堂里,住的都是知识分子和工商联的。1号楼下住的是一家姓吴的大资本家,三楼住家是我们整个弄堂的二房东,我们都要付租金给他。这个人姓陈,广东人。2号是我们家,我爹爹是工商联的,3号4号住着的是著名出版家赵家璧。5号楼下一半住的是著名记者曹聚仁一家。“文革”中后期,赵家璧一家被扫地出门,搬到山阴路大陆新村去了。曹聚仁一家“文革”前就搬到南京西路去了。

我们弄堂是封闭式的,所以很少有人进来。几家小孩经常都

聚在一起玩耍,还互相到各家去白相,我当时到赵家璧家里玩的时候,看到一幅老先生和毛主席拍在一起的巨幅照片。天热了,我们都到弄堂门口乘风凉,曹聚仁、赵家璧夫妇有

赵家璧和我们乘风凉

赵青

时 also 到弄堂口乘凉,和我们小孩聊天,赵家伯伯讲徐志摩是他的先生。赵家璧夫妻俩长得胖笃笃很有福相。曹聚仁个头矮小,但人很精神。曹家伯伯闲话不多。

我记得我爹爹和著名演员张伐关系很好,张伐就是电影《红日》当中扮演解放军军长沈振新的那个人,他经常到我家来玩。著名演员吴云芳(在电影《乔老爷上轿》